

讀書通訊

半月刊

* 第五十五期目錄 *

學術論著	再論現實性的科學研究……………	盧于道
哲學	管子的戰爭哲學 (講座)	高語罕
詩歌	習法三闕……………	朱學山
譯著	馮沅君「才人致」辨正 (英文)	吳曉鈴
譯著	王清彬譯「信仰與行動」……………	程希真
學人	田園科學家丁穎 (小傳)……………	麥耀威
通訊	隱居磁鎮的四川教育學院……………	雷國鼎
文化記事	一、范存忠氏新著「語言哲學」 二、金克木氏論「當代印度叢刊」 三、張政烺氏著「古書古義」	

編輯兼發行

中國文化服務社讀書會

地址：重慶打銅街

電話：二一七

再論現實性的科學研究

盧于道

我在思想與時代第四期發表「我國科學之新時代」一文，最近在「文化先鋒」一卷九期又發表「現實性的科學研究」一文。此二文的意思，是希望我國作理論科學研究的科學家，放棄其執拗的學院主義觀念，代之以現實主義的自覺性，作為今後科學研究的方針；我的意思是通過這種科學家的自覺，而後逐漸實現科學對於抗建事業發揮其應有的力量。

最近看到「中國青年」第七卷第二三期合刊上面，有一篇吳大猷君論科學研究及國防一文。當初看到這個題目時候，以為吳君是論如何將科學研究工作用於國防建設的問題；再翻閱之，原來題目下面有一個附語，說是「評盧于道君之我國科學（家）之新時代」（按上列「家」字，是吳君代我加上去的）。我對學術討論，是很有興趣的，故細心讀下去。讀完之後，但見該文武斷接續多於理論探討，不禁為之失望。我祇得簡略地答覆之於后。

吳君說：

「勉我國理論科學家脫離『學院主義』之『抄襲西洋』之『裝飾品科學』而『負起現實事業的責任，意至善也。』（吳）

我國科學家於抗戰期間，未盡有積極之貢獻，作者常有同感。在吳君文中既說到「意至善也」，並「常有同感」，心中甚為自慰，原來我們出發點是相同。原作者又說：

「至此問題之癥結所在，則作者之意，未盡與盧君相同。』（吳）

然則吾人所不同者，是對於科學在抗戰期間，未能有積極貢獻之癥結所在。依照吳君的意思，癥結究竟在那裏，在該文未說，有二語如下：

一、……實由於政府未能動員彼等耳。』（吳）

二、……之缺乏。』（吳）

所以吳君是嫌我國政府未動員科學家，並且「各項人材」太缺少。至於他具體的建議，有如下述：

「……以為我國亦應效法西洋，組織若干中心實行之機關，熟練國家之需要，決定進行之事業，然後制訂計劃工作之規模，分配人才，以解決所有相關之各種困難問題，使「習科學者」及一部分之「科學家」，雖未必具有所需之專門技術，亦能各就其所長，藉分工合作之道，對國作較直接之貢獻。』（吳）

這便意思，亦就是我在「我國科學之新時代」一文中末段所說，以英國科學顧問委員會為例，「希望不久有健全之科學組織」之意。不過吳君是希望政府來組織之，我則未限定政府組織；即科學家亦可以自動組織之。我特別強調者，是科學家先有現實主義之自覺，否則科學家沒有這種自覺，則政府雖欲組織，科學家欲緊抓住「象牙之塔」之研究而不理會，亦是可能發生的事情；如果是如此，則雖有組織亦是枉然。

以上所提出吳君之「善意」，及和我的「同感」，想讀者閱之，亦必可以告慰的。

現在我要解答者，乃是吳君所謂「不通」及「陋見」之處。

我原文說：

科學的理論研究，無論是屬於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或人文科學，都是尋求真理。假使我們說因為抗戰建國，要大家放棄這種尋求真理的理論工作，而從事於技術工作，這種見解，是「欲速見小」，根本錯誤的。……錯誤就是在認其理論為無用，和現實的軍事，經濟建設事實無關。然而事實上正相反，真理是具體的客觀存在，是現實問題的解答，是「一切建設事業的指示方針，不是空洞的脫離現實的產物。』（盧）

這一段不是說得很清楚麼？在抗戰期間，我們仍然需要追求真理的理論研究，不是要大家放棄理論工作。我不知道吳君不會細讀這一段文字，抑或有意歪曲我的原意，將我原來強調理論研究工作之重要性避而不談，轉而談及……此類尋求真理者，固不肯以尋求偉大，其求之發明為目標，其研究之對象更可與「現實」具體之問題無關。……」（吳）

這價真理的具體性與現實性的理論問題，因為牽及過遠，我原文並未論及；今藉此機會，可以再為之說明。我們要問研究物理學的吳大猷君，能不能指出一個物理學內的真理，其內容是空洞的而不是具體存在？能不能提出一個物理學內的真理，其性質是超然的而不能對於人類現實問題有所指示？吳君原文，沒有提出這種例子，他祇是說：

盧君謂凡不具體不現實者皆非真理，恐古來尋求真理之先哲大半不承認此說也（吳）

華爾吳君說的是「大半」而不是全體。究竟吳君所謂「大半」者是百分之幾，吳君沒有給我們一個說明，有一部分先哲曾不承認此說，我是承認的。例如柏拉圖及其學派，是有這種主張的。但是主張真理必須具體而現實者，亦大有人在。剛巧我手邊有英國 Nature 週刊第一四七卷三七八號，第四二七面上 Buxton and Priestley 之論辯中（題為純粹及應用生物學的關係），引化學家波義兒（Boyle）一語如下：

For Robert Boyle, True Science was such knowledge as hath a tendency to use (Nature, April 12, 1941)

（以波義兒之意，真正科學是有實用傾向的知識。）

李少我們看見了一位科學界的先哲，說了這麼一句話。至法郎西培根主張學以致用，實驗主義哲學家主張真理之實用意義等，我不必再舉，因為這是大家所熟知的。而吳君所謂「若謂不具體不現實者皆非真理，豈可通乎？」者，這似乎是典型的柏拉圖主義，若欲和這種思想辯論，這是另外一個問題，至少是有主張真理應有實用意義的先哲，已可以使吳君知道了。

吳君原文有下列一段話：

盧君發問（法？）拉第之發現電磁透（誘？）導為說明，實亦似是而非之論。一五三二年時，該發現可謂遠離現實者。無論發拉第作研究時未作電氣工業之想，即任何人亦未預見該現象對人類文明之重要。所謂具體實現，乃數十年後事耳。（吳）

吳君譯文，好像法拉第之發現，在數十年還是具體實現了；法拉第發現在一八三二年，愛迪生之應用此種原理以發明電燈是一八八二年，其間相差五十年。原文是：

一八三二年……而後有利用感應現象之發生……有電發動機之發明，

而後才能有近代電氣化各種工業建設。

我是說的「而後」，由法拉第發現電磁感應現象，經過兩個「而後」才達到電氣化工業；我沒有說「立即」，故我原文是似是而非，吳君所謂「似是而非」，乃是「似非而非」矣。既是法拉第的發現，啓示了以後的電氣化工業，豈不是我在上面所說，真理指示現實的工業建設麼？

非惟此也，吳君上文所說「即任何人亦未能預見該現象對人類文明之重要」，不幸這是一句謊話。首先，法拉第自己是預見的。英國財政部長格爾斯頓（Mr. Cardone）有一次訪問法拉第，他看見許多碎片儀器，就向法拉第說：「這些東西究竟有什麼用處？」法拉第給他看了許多東西之後說：「怎麼？你可以抽稅的！」（見 Hogdon, Science for the Citizen, P. 107）若是可以抽稅的，難道對人類文明還不重要麼？難道法拉第未能預見其發現工作對於人類文明之重要性麼？這明明是吳君代法拉第說了一句謊話！更何況在法拉第研究電磁感應之時代，適為電氣應用之開始時代；一八三一年法拉第發現電磁感應現象，一八三五年有電報出現，一八五一年英法通海電報線首先敷設成功，這些現實事業雖不是電磁感應現象之應用，却為當時電氣化工業發達之預兆呢。

吳君又說：

至若現實問題之研究，在歐美各國，平時皆不責之於所謂科學家，而由所謂技術人員處理之。

我不知道吳君是否承認法拉第是科學家？如果是的，則一八二四年英國皇家天文學會委員會，亦曾請他研究光學玻璃生產之化學。我不知道吳君是否承認巴斯德是科學家？如果是的，則法國政府亦曾請他研究霍亂的疾。這種例子，不勝枚舉。至於近代歐美各國，由政府派請專家研究營養問題，精神病遺傳問題，調查財產問題，諸如此類的科學問題，大概這些專家皆不在吳君所謂「科學家」之列。吳君自己問之，「不將為之驚訝或失笑乎？」

吳君又說：

近來英美等國之大工業機關，並特別注重所謂「基本研究」之工作，具有轉機理論科學家主持其事者。其研究項目中，乃有關於分子之構造者。淺識之士，不將為之驚訝或失笑乎？（吳）

吳君若以為大企業有理論研究有人為之一驚訝失笑，則我在「我國科學之

管子的戰爭哲學

(未完)

高語罕

(七)

管子知道，雖然對於戰時的財賦，工業，武備的生產以及選士也，教育也，習俗的準備工作皆已最到應有的地步，但是敵國與其他各國之國情及國際間對於我之一切態度與關係若果不能洞悉無遺，真切知悉於我有利，則發動戰爭，仍然沒有把握，所以管子接着更努力做偵知天下諸工夫。這工夫有三方面就是依據各種情報，一方面對於自己的各種力量，一方面研究敵國的力量；另一方面是研究國際間有多少國家是站在我們方面的，有多少是站在敵人方面的，有多少國家可以保持善意的中立的，有多少國際對我有意，是否可以盡最大的努力，使之中立的。在這個敵我兩條陣線的國際勢力的清算之際，我們的工作可以概括一句說，就是「知己知彼」的工夫。管子的「知己」的工夫，第一是「知已」的工夫，但是這種「知已」是一個一般的工作，此外還有一些關於民生問題，最高當局若不勤求訪問或加意考察，則上下之情隔，民間之真相莫由上達，管子會切言之道：「請入而不出謂之察，出而不入謂之聽，入而不入謂之侵，出而不入謂之誑。滅絕侵誑之君者，而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故政之不行也。」（法法第十六篇，文依管子今說校勘）這種考察的結果，就如管子所精心的一「當上選於百里，當下選於千里，門廷選於萬里」（法法第十六）使使天下官吏或不合理的民衆

組織了一大堆調查表，讓一些狡猾為奸的吏胥造一大堆統計表，那也是距離事實十萬八千里。怎樣會漏悉民隱確達國情，一切知實實？所以管子就輔助「桓公使鮑叔君臣之有善者，晏子不仕與耕者之有者，高子職工買之有善者。國子為李臨則為東國之靈骨無為西土，弗能為矣。凡仕者近官，不仕與耕者近門，工領近士，三十里則遠委焉，有司職之。從諸侯欲通，吏施行者，令一人為負，以車若宿者，令人養其馮，食其委，客與有司別契，至國入契，費儀數而不償，有罪；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士欲通，吏不通，五日，囚；貴人子欲通，吏不通，二日，囚。」（依管子今說校正文頁四五）這種舉動不惟是要洞達民隱，網羅人才，並且要顧到外來的僑商，使他們不會發生困難，引誘商情之盛。這還不夠，管子又勸勉公卿，「正月之朝，鄉長進事」之時，「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善者為義，好學禮則，仁慈孝於父母，長弟關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則已於事前而後，公又問焉。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季勇敢賊之力，前曾秀出於業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前而後，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騷擾淫蕩，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北，其罪五。有司已於事前而後。於此鄉長進事而修德焉。』」（依管子今說頁四七六）。這些要知天下民衆的實情，故問之鄉長，又恐怕鄉里有所蒙蔽，故於「正月之朝五

新時代第二節提倡非工業機關，亦應當繼續作理論研究，這一點意思還有被看懂，豈非更「海」試再讀原文第三節於下：

「覺悟到我國有理論科學研究之必要，是在五四以後，至今不到三十年。這種覺悟是進步的，是本能的。假使我們能依着這種覺悟而發展理論科學以及其研究工作，則和現實是不至於斷絕的。」（虛）

這一段文字，還不夠明白麼？我不是在提倡理論研究麼？再將吳君原文讀下去，更發現了好些斷章取義的引文，「不通」「一陋見」，最好放在一邊，不去理會。

我可以再提出我的問題及解答如下：

問題一：我們要不要理論的科學研究？

答：要的！（吳君之意同此）

問題二：我們理論的科學研究，應當走學院主義這條路線？抑應當走現實主義這條路線？

答：應當走現實主義這條路線。

吳君對於第二個問題的解答，和我不同；他說應當走學院主義這條路線。這兩條路線，有什麼不同？簡言之，即

學院主義：為真理而真理。

現實主義：為現實作用而真理。

我的意思，非但應當如此，並且科學史告訴我們說，非如此不足以發展科學的。一八六六年，德國化學家李比希在慕尼黑皇家科學院講物質科學發展史有曰：

The history of physical science teaches us that

屬大夫從事於公之際，輔助桓公其成功者而歸之，「（體之就是賄賂的意思）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何以不及人？故訓不吝，政事其不治，一再則有，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其居處為義，好舉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已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孝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蹇濇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於事而竣。於是乎五屬大夫退而修屬，屬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聚，正夫有不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守成固，以戰則強，封內治，百姓親，可以出征於四方，立一霸王矣。」（管子今證頁四七七）這是管子備戰之知已的工夫。

至於知彼的工作管子看得和知己是一樣的重要。兵法講說：「兵無主則不早知敵……故曰：早知敵則獨行」。又曰：「……故不明於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於敵人之情，不可約也；不明於敵人之勢，不先軍也；不明於敵人之士，不先陣也」。樂毅曰：「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希，以事伐者王，以敵伐者勝，而謀有功者五：一曰：觀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內必哀也。臣不為用，其國可危。二曰：觀其陰所憎厚其貨賂，轉情可深。身內情外，其國可知。三曰：聽之淫樂以廣其心。四曰：以孝慈美人，以寒其內，遺以詭臣文馬，以蔽其外，外內蔽可以成收。四曰：必身親之，如與之同

生。陰內辯士使圖其計，內勇士使高其氣。內人他國，使背其約，解其械，拂其意，是必兩門。兩國相敵必承其弊。五曰：深察其謀，蓋其忠臣，換其所使，令內不信，使有離意。離氣不能命，必內自賊。忠臣已死，故敵可奪，此五者謀功之道也。」（管子今證頁四〇三——四〇四）八觀篇又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耘，計其農事，而後他之國可知也。……行其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富之國可知也。……入國邑，觀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修儉之國可知也。……觀凶慶，計財役，數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入朝廷，觀左右之朝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強弱之國可知也。……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於其民與不行於其民之國可知也。……計數與，量土意，察國本，觀民衆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管子今證頁二四二——二四七）欲施五謀必先做八觀的工夫，八觀實在就是國際情報網的最高原則；五謀乃是根據八觀所得之真實情報而對敵國國際間諜網的工作。管子在春秋時代是一個最善於運用這種外交軍事策略的人物，譬如：「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善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仲對曰：未可。治內者未其也；治外者未備也，故使鮑叔牙為大謀，王子臣為將，弦子新管理，甯戚為田，馮朋為行，曹孫宿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徐開封處齊，晏向處燕，容友處晉。又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使出，周游四方，以說召收求天下之賢士；飾玩好，使出周游於四方，贊之權侯，以觀其上

下之所貴好，擇其沉亂者而先攻之。」（管子今證頁二四二——二四七）

our knowledge of things and of natural phenomena has, for its starting point, the material and intellect wants of man and is conditioned by both.

（物質科學史告訴我們說，我們對於事物及自然現象的知識其出發點為我們的物質及知力需求，並且受此二者的影響。）
假如我們忽略了物質需求，則科學知識是不會發展的；同樣，如果我們將求知的慾望和物質的需求相分離！——即我所謂學院主義！——則物質科學亦是不會發展的。
同樣，生物學家赫胥黎的孫子 Alceus Huxley 有曰：

I regarded the search for truth as the highest of human tasks and the searchers as the noblest of men. But in the last year or so I have begun to see that this fangous search for truth is just an amusement, a distraction like any other a rather refined and elaborate substitute for genuine living and that truth-searchers become just as silly, infantile, and corrupt in their way as the boozers, the pure aesthetes, the business man, the Good Templar in them. I almost perceive that the pursuit of Truth is just a polite name for the intellectual's favorite pastime of substituting simple and therefore false abstractions for the living complexities of reality. (Point to point, p. 1424, 見 Bennett's 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 p. 97.)

上文簡單的意思，就是說現實生活是繁雜複雜的；為真理而真理者，是逃避現實，是自己娛樂，要簡單得多。走入現實，正視現實，以理論的科學研究改進現實，這就是我所說的現實主義的理論科學研究。

卅一，十一，八。於北稿。

管子合前頁四七八）希特勒的第五縱隊和日本的間諜網，在今其自然是對於敵國的情報與間諜工作，可算得無所不用其極，就連英美也自愧不如，但管子在前三千年前，便組成這種情報系統，當然更令我們這些小後生不得不自承是「數典忘祖」了！不但此也，管子在那時已注意到「地圖」為軍事行動之必要條件，而且認為是先決條件，地圖篇說：「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嶺巖之險，河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險阻丘阜之所在，荒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各都鄙邑附庸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措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人之衆寡，士之精麁，器之攻守，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參看管子今註頁三九九）這種知的工夫乃是兼知己知彼兩方面言之。若敵人攻入國境，則我對於本國之山川阨塞，道里遠近，地形出入，人之衆寡，士之精麁，士之功苦應「盡知之」，反之，我軍在敵國境內作戰，又必須盡知敵國之山川阨塞等等。不惟要盡知敵我兩方之地理險要，並且要知道其他一切中立國的地理險要，因為今日之中立國，也許明日便變為敵國或同盟國，那末這些國家的境內皆有變為戰場的可怕，不能不預為留心，管子真人傑哉！

(八)

戰爭準備，即動員準備做到如此地步，真可算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這個東風，用古代兵學用語說：就是「機數」，這個「機」字，本來就是「機」字，易曰：「知機其神乎？」機是極繁複的社會現象和物理現象中的最高的最終的和最玄妙的原理，是由極繁複的社會現象或極繁複的物理現象，或二者的更互作用抽繹出來的基本的運動法則，數就橫的說來，是合彼我一切之質與數量的綜合的比較，就縱的說，乃是依彼我之一切力量從時間的觀點出發；誰支持較久，誰運動得較速，誰便佔上風。這種計算，一半是靠着彼我的各種情報來決定；一面却靠着我們的最高當局依長敵我力量之綜合比較，匠心獨運，而加以天才的判斷和決定，如戰爭的對象，發動的時間，力量的配合，皆須加以精確的選擇。希特勒之閃擊北歐，選擇星期六晚，日本閃擊太平洋，英美的根據地，也選擇星期六晚為發動時期；從戰略的觀點說，這便是明於機數，所以他們能獲得初期的勝利，希特勒之攻蘇也，認為一兩月便可以蕩平，日本之侵中國也，認為三個月便可以征服全中國，結

果大吃苦頭，乃是關於此中「機數」害之也，軍事間諜網一就管子一書說，忽從三方面來認識：（一）政略。對人發動戰爭，第一是要獲得國民全體和國際間最大多數的擁護，那末必得名正言順，敵人家曉得我之用兵為不得已，為的是「弔民伐罪」，「順乎天而應乎人」或為的是「救亡圖存」，這就叫做「師出有名」。管子曰：

「治其民矣而不明於為兵之數猶之不可；不能強其兵而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謀強其兵而不明於勝敵國之理，猶之不可也。兵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勝敵國矣，而不明於正天下之分猶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為兵有數，勝敵有理，正天下有分。」（七法篇）

又說：

「若夫地雖大而并兼，不攘奪，人雖衆而緩怠，不做下，國雖富而不泰，不縱慾，兵雖強而不侮諸侯，動衆用兵，必為天下正理，此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重令第十五）

「至善之為兵也，非地是求也，非人是君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海內。民之所利，利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為六千里之地則大人從；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幼官篇）「計得地與實而不計失諸侯，計財委而不計失百姓，計見親而不計見衆。三者之屬，一足以前，遍而有者亡矣。」

管子必特在政治上獲得民衆的擁護，始行發動戰爭的決定，而要得到人民大眾的擁護，又必得在經濟上顧到他們的生活問題；要顧到人民的生活問題就不得不抑制大地主和大財閥以及投機商人之過分的剝削，尤不得不顧到那些為國而死的寡婦孤兒，管子一面照着上頭所述的六十八問洞悉民間的一切疾苦，一面用政治力量抑制豪強，例如他答「公欲置死事之後」一問道：

「吾國之豪家選封食邑而居者，君車之以物則物重，不車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之以物則物輕。故選封食邑富商蓄積餘藏，而君之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購積案而就土室，朝功臣世家選封食邑，而君之家此吾國之豪也。城既毀而無委致國，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放左右，請以平價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釜編之數，不得為侈弁焉。困窮之民聞而釋之，釜編無止，遠道不攜

，因粟之值生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換孤寡，收貧病，視窮老
窮而無子者，得相繼而養之，勿使赴於溝壑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顯
行，不偷而爲用，費死共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
輕重之分使然也。」（依管子今註頁五七〇）

管子的這種辦法就是現在限制投機家并發動紳良捐輸財物慰勞陣亡將士的家
族和「傷兵之友」的運動的前驅。而現軍政最高當局之所謂三分軍事，七分
政治，亦此物此志也。

（二）戰略。管子的戰略第一個特色是閃電戰，注全力爭取時間與空間
的先著，他說：

「素若時雨，寒如飄風，一之終也。」（兵法篇）

「器械欲施，追亡逐遁，若飄風，擊刺若雷霆。」（兵法篇）

「收天下之羣傑，有天下之稱材，設行若風雨，發若雷霆。」（幼官篇）

「收天下之羣傑，有天下之稱材，故衆之如飛鳥，動之如雷霆，發之
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圍。」（七法篇）

「故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遠道里矣；有飛鳥之舉，故能不險山河矣；有
雷霆之戰，故能獨行而無敵矣。……風雨之行，速也；飛鳥之舉者，輕也；
雷霆之戰者，士皆也。……不遠道里故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河，故能
服恃固之衆；獨行無敵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國救邑不恃遠與之國，故所
指必聽。定宗廟，育男女，天下莫之詭傷，然後可以育國。」（七法第
六）

「……故存國家，定社稷，在卒謀之間耳。」（權言第十二）管子的戰
略第二個特色是「避實擊虛」。他說：「善者之爲兵也，使敵者據虛，
若據形，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形無爲焉，無不可以化也。」
（兵法篇）

「凡用兵者，攻堅則難，乘瑕則易，攻堅則難者，乘瑕則難者，故
聖其堅者，其難者，屠牛桓朝鮮九牛而刀可以鑿鉄，則亦游間也。」（
制分篇）

「故善攻者料衆以乘衆，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衆攻衆，衆存不
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料實而攻虛，料堅而
攻廣，料強而攻弱。」（霸言第二十三）

管子的閃電戰有兩個必要條件：一個是用獅子搏兔的力，即集中全部力量
攻敵人的某一弱點；一個是絕對地，儘可能地爭取時間與空間的進度，以
疾風驟雨，迅雷不及掩耳的姿態出之。這一六次大戰的歷史件之證明中國兵
學家之祖的管子的戰爭哲學是絕對正確，而閃電戰這個新穎的術語也就沒有
絲毫創造的內容。據說：在日本在太平洋發動閃電戰的前數日，中國最高統
帥部曾有兩電致英美軍政當局，促其特別警戒，勿遭敵人暗算。英美當局，
（尤其美軍當局）忽之，遂受此嚴重之打擊，可恨也夫！然而吾國最高統帥
亦因此更見益於英美軍事家，而英美軍事家實在也有些健忘，因爲希特勒之
閃電戰已經打了英法人的臉蛋，難道日本人不會效法嗎？譬如美國哥倫比亞
廣播公司駐柏林記者希萊威廉的戰時柏林日記說：

「兩星期前的今天希特勒在西線發動他的閃電戰，從那天以後，就發
生下面這些事實：荷蘭滅亡；五分之四的比利時被佔；法軍向巴黎撤退
；同盟軍被圍在海峽一帶！……你只有看見了德國軍隊，你才會相信這是
事實。他們的空軍佔絕對的優勢。那聽來似乎是不能置信的，但却是
我在前線親眼看到的。自始至終，同盟國的飛機一架都沒有。史德卡倫
衝鋒隊到了同盟軍的防禦陣線，只消一攻就可攻破，同時他們又破壞了
同盟軍後面的交通線，毀滅了那些具有軍事價值的車站和鐵路聯絡點，
而且偵察機還飛到前線上一切情形完全報告給德國統帥部……你在前線
所見到的最能使你不忘的，是德國人在輸送軍隊大砲和給養的時候，規
模非常巨大，而又一點不受阻礙。在前線，你每小時行四五十英里路，
整天都會遇到無數的機械化行列，他們行經比利時，從未絲毫間斷，而
且他們的行軍又還未快！每小時三四十英里！」

這并不是新花樣，更不是歐洲現代軍事的新發明，在東方，尤其是在中國老
早就說「閃電戰」爲用兵的經典了。日本軍事專家是這種理論的學生，中日
之戰，日俄之戰，他們都是在談判尚未破裂之前，「不宜而戰」，中國的語
語叫做「先下手爲強」！

日本在東方對英美的太平洋上的根據地所發動的閃電戰，在一頁一夜之
內毀滅了美國在夏威夷的海軍根據地。（美國在太平洋第一線的空軍至少損
失了百分之百架以上，主力艦兩隻，海軍官兵數千；英國在新加坡損失了有者
的兩主力艦，尤其是威爾斯親王號。）佔領上海，攻襲香港，九龍非線戰，

途甚廣，學法律的出路沒有什麼問題；但按之實際，竟大不不然。究任司法官是法律學生的一條主要出路吧，然而，請看，這是一條「路」是怎樣一條路呢？法律系學生初畢業，僅能由司法行政部派充學習書記官，每月月薪四十元；若若干年，升候補書記官，每月月薪五十元；若若干年，升正書記官，月薪七十元，實支六十六元。此司法官中之屬於委任者。至若推檢，因為是委任官，大學畢業生要取得薦任資格，必須經過高等考試。高等有初試再試之分。司法官考試初試及格，須須送由司法院法官訓練所訓練，期間六個月，訓練期間，舉行再試之筆試，筆試及格，分派各法院學習六個月，學習成績與初再試之筆試成績合併計算，成績及格，發給及格證書，這才有資格任用。怎樣任用呢？依法初任推檢者，試署地方法院的推檢，但如無推檢員缺可署時，則暫充候補推檢，分發地方法院辦理事務。是試署為原則，候補為例外；然一查俯小實況，便知初進法院，殆無一不是候補，例外早變成原則了。在候補期間，每月津貼額定一百二十元，實支一百零六元，夫既稱津貼，自不能像官太少，其不能不使人驚心動魄者，在於這候補是一隻「氣球」，上船之後，定必受「風浪」之衝，且究竟需幾多歲月，殊難逆觀。就算官運亨通，居然補到實缺，但因為是初任推檢，當然祇能發最低薪俸。換檢的最低級俸是二百元，五十級薪之外打八折，實支一七〇元。俸祿固甚微薄，但這時畢竟是國家的一員官了！不過我們看到過中央機關用辦事，薪津合計常在二百元以上，是以一命官一與辦事比，已經相形見绌；假如這些推檢們再去看看同時畢業的經濟系同學，剛進出學校，便跨進銀行，除得每月薪水年底分紅以及獎金等各為數百十元不等外，現在還有積貯米貼隨時生活津貼乃至眷貼，一共每月復不下數百元，這如何能不便這些法官們深深地慨嘆：進身之難易，待遇之厚薄，其間差別，竟如是夫！竟如是夫！

最後來談學法律的人是怎樣的不惹人喜。在中國誰一提到「法律」，大概人們很容易聯想到「殘刑案」；提到法官，人們就聯想到「酷吏」，提到律師，人們就聯想到「訟棍」。儘管事實上律師未必皆訟棍，法官未必皆酷吏，而且學法律的人未必全是當法官作律師，但在人們看起來，他們既治刑名法律之學，似總不免是推磨或推訟棍之流。在西洋，則有一「好的法律家是壞的鄰人」的諺語，可見學法律的人之被人厭惡，是無間中外的。事情也太巧合：商鞅和韓非是先秦的兩大法學家，但一則商鞅變法之前，一則韓非著《法法》自盡，這就難怪一般人也學法律自盡之感了。還有我們歷史上具司法家精神的政治家，如宋之王安石，明之張居正，也都沒有好結果。王安石生時便被人譽為「陰險險狠與人異趣」的「大盜賊」，張居正死後還要被抄家，於是所謂刑名法律之學遂漸被人們視為不祥之物，試看一雙父兄之最勉其子弟，祇有教他們讀詩書，絕少教他們讀律令，就可知道。昔者有云：「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從必殆夫身。」我們中國人一向是好詩書惡律令的，現在學法律的人偏偏習律令而不讀詩書，自然就是「從必殆夫身」的人；既「從必殆夫身」矣，如何能不被人厭！

法律本身不易學，學了也沒有什麼好出路，學法律的人並且是不惹人喜，有此三關放在學法律的人的頭前，難道有那麼多的勇氣能走完了這三關！加上教育部二十三年限制文科科招生令的限制法律系招生，年來各大學法律學生之逐漸減少，自屬必然之勢。那些還硬著頭皮在學法律的少數青年。因為終日處在嚴厲法律部法律的氣氛中，自亦唯有自慚形穢了！

不過對這件事，我們却另有看法：法學誠然是艱深的，法律系的功課確實是繁重的，但正因為它艱深，正因為它繁重，才愈覺法學之津津有味，是法律本身不易學這一關，應該阻不了有志青年的勇氣。法律對於社會生活關係密切，用途甚廣，這是事實，故法律學生之無出路，止是我們這社會一時的畸形現象，就司法官言，年來多少人在軒轅過要路高，多少人在攻擊候補制度，最近聽說最高司法行政部已有取消候補制度之意，可見學法律沒有什麼好出路這一關本身已經在動搖，將來自不難被克服。至於學法律的人不惹人喜，我以為每種學法律的人自己該反省。原來法學和其他各種學科一樣，其本身祇是一種工具，為惡為善，全看你如何用它，現在你既不惹人喜了，你就該想想會否用它去作惡。在學法律的人當中，恐怕要以律師為最不惹人喜，若問：「原因安在？」那要試看看幾個律師真正能保障人權？有幾個律師不挑撥是非，有幾個律師於當事人來請教時不唯恐其說不成？當事人涉訟之後有幾個律師不是唯恐其拖遲不久？甘地先生也曾當過律師，但他向來對於任何案件凡不能確定委任人有理的即拒絕接受，他又看到：兩造中勝訴的一造，也難能補償其涉訟時的損失，故和解是最好的辦法，所以他說：「一個律師的真正職能，應該是和解已經破裂的雙方，在

馮沅君「才人攷」辨正

(續)

吳曉鈴

(三) 舞社 秦宮雜劇清樂社

「舞社」，見張協狀元戲文高麗芳曲「敬坊格範，舞社可同聲」句，都城紀勝「社會」條下載「秦宮雜劇清樂社，此社風流最甚。」又夢梁錄卷十九「社會」條下也有「富豪子弟舞社清樂社。」這都是一個社集的異名。馮先生據武林舊事卷二「舞社」條「大小全棚傀儡」下載「舞社」條，遂說「可見舞社舞隊之事，不過胡應麟是認爲他以雜劇爲主的。」這話是對的，不必把胡應麟拉來作證，武林舊事卷三「社會」條便有「舞社」雜劇」的說法，不過這雜劇乃是指着宋代雜劇而言，我們只認爲它是一排優歌舞雜奏」的歡樂情緒，決非表演故事的代首體的劇曲——元代雜劇。宋代雜劇的內容非常廣汎，舞隊，傀儡，唱賺，要詞，影戲，詞話等差不多全都包括在內；宋元戲曲史有云「宋代戲劇，實綜合種種之雜戲；而其戲曲，亦綜合種種之樂曲。」實在就是這個道理。舞社既以雜劇爲主，諸書載記於「舞隊」之外又同入于「社會」之下，可見它還是以表演爲主的團體，並非編著劇本的「舞會」。

(三) 舞社

「舞社」是宋代民間一類閑浪子弟用器

在唐以前用以相炫耀的一種最下流的「社會」。這在唐代便已是很興時的風尚了。段成式的酉陽雜俎前集卷八載錄其事甚多，名之曰「刺」，如

蜀人王於刺，分明如畫。或言以戲則色鮮，成式問奴輩，言但以好惡而已。又叫做「刺青」；

蜀小將軍少卿，章表微堂兄也。少不喜書，嗜好刺青。

又簡稱做「刺」：時大審坊土者張餘翁左眼曰「生不怕京兆尹」，右眼曰「死不長閻羅王」。

這種人都是粗粗野野的；上都舞隊少率羣而演雜劇象物形狀，特諸軍張拳強劫，至有以蛇集酒家捉羊，

又賦建武建節一百六十歲帝印紫鵲等，左右應刺言「野鴨避頭宿」，朝朝被鴉相，忽驚飛入水，留命到今朝。」

更悍潑刺之狀可見。宋代此風尤盛，名曰「花繡」。繡社便

是這類人們會合的團體之一，有武林舊事卷三「社會」條「繡社花繡」句可證。又百廿回的水滸全傳第八十一回「燕青月

夜過道君，戴宗定計出樂和云……數杯之後，李師師笑道「聞知哥哥好身紋繡，

我執行業務的二十餘年間，我的大部分時間是相於從事私自和解方面。——我們有過這樣的律師嗎？果有這樣的律師，我不相信他還不被人家愛戴！美國康納爾 Cornell 大學校長 Andrew D. White 則會這樣告誡他的法律學院的學生：「我們辦法律學校的目的，非在造就許多訟棍；乃欲以嚴格的訓練，提高其程度，使將來出校之後，有深厚的學問，有遠大的目光，有高尚的道德，若再加以相當的經驗，則無論爲法官，爲律師，爲各種公共事業，鮮有不成功爲造福國家的法學者。」我們學法律的人尚誠能於具備深遠的學問之外，還有遠大的目光，高尚的道德，並存心爲國家造福，那如何還會不惹人喜愛？這一萬步說，倘使這時竟仍有偏見甚深者厭惡學法律的人，那麼聽隨他好了，他的愚行對學法律的人將無絲毫損害之可言。

上面這一段話，並不是故作樂觀來自慰藉，試看民國三十年三月國民參政會第二屆第一次大會中就有入提出請政府注意法律教育案。大會對這一提案的決議謂：「查法律學之發達，關係國家根本，而法律人才，並爲建設事項所需要，應請政府切實注意，詳定辦法，俾達此目的。」同年十月間教育行政當局發有一「關於法律教育案」之意，切盼大學各院系平均發展，到這時候，法律學生至少可以不必再自慚形穢了。不過儘管如此，我們並不願鼓勵每個大學生去學法律，猶之我們不贊成鼓勵大學生都去學理工，我們祇希望有興趣的青年們不再因爲看到種種而灰心而氣而終至非心願地轉入他途。

中國法系爲世界五大法系之一；在先秦政治思想中，法家雖不能說是主流，但確是有力的一支，惜以湮起乏人，不特未盡發揚光大，抑且久有成爲「絕學」之勢；再說我們唯有建立一個法治的國家，始足以樹長治久安之基，這已是無入爭辯的問題了，而問題只在怎樣去實行。學法律在目前誠然是走「冷門」，但「冷門」絕非「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以此種抱負來走這「冷門」！

(完)

願求一個如何？」燕青笑道：「小人體體體有些花樣，怎敢在娘子跟前預衣襟體！」李師師說道：「錦體社家子弟，那裏去問這衣襟體？」三回五次，定要討看，燕青只得脫下來。……這裏把錦體社的情形講得很清楚，社中子弟都是些無賴痞棍，當時國家的法令對於身上刺有花樣的人是，不許入場與試的。所以錦體社既非「寄會」，錦體社家子弟也與編劇沒有絲毫關係。

(四)八仙社

東京夢華錄云：「十二月即有貧者三教人為一伙，裝婦人神鬼；敲鑼擊鼓，巡門乞錢，俗呼為打夜呼。」我頗疑心八仙社與「裝婦人神鬼」的「三教」有關係，這是一種化妝為八仙形狀的舞隊的組織。

(五)十間社

內容無攷，但不是一「寄會」即可斷言的。教坊記稱：「女伎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其骨肉結教坊中，謂之內人家，其得幸者謂之「十家」。或者「十家」在宋代說為「十間」也未可知。教坊中的女伎官然是以歌舞為主，那麼「十間社」也許是這樣的一個團體。

從上面所論諸社看來，大約張先生是把武林舊事，夢華錄，都城紀勝諸書「社會」條下所載的名目都誤會做「寄會」的名字了，殊不知宋代的「社會」有同于元代的「社火」（即「社伙」、「伙」為「夥」之簡寫），也就是現代參加迎神賽會，朝山進香等慶典的「會社」，每逢節節便都出來進獻。

武林舊事卷三云：

二月八日為利川張玉生辰，各山行宮朝拜極盛。百戲競集，如：綉線社（雜劇），齊雲社（戲球），……夢華錄卷十九云：

諸家建立迎神者俱有社會。……每遇神聖誕日，諸行市戶俱有社會迎歡不一。都城紀勝也說：

又有茶湯會，每遇諸山寺院作齋會則往彼以茶湯助緣，供應會中善人。……每歲行都神祠誕辰，迎歡則有酒行。

社會的種類頗多，有的以表演「諸色技藝」為主，武林舊事卷三：

綉線社（雜劇），齊雲社（戲球），通雲社（唱賺），同文社（要詞），角瓶社（相撲），清音社（清樂），……英略社（使棒），雄辯社（小說），翠錦社（行院），繪革社（影戲），淨塵社（梳剃），律華社（吟詩），雲霞社（撮弄）。

有的商賈以陳列「奇珍異寶」為主，夢華錄卷十九云：

七寶行：七寶玩具為社，……青果行：時果為社，東西馬路：異松怪柏奇花社，魚兒活行以異樣編魚呈獻。

都城紀勝云：奇巧飲食社，花果社，七寶收古社，皆有中外奇珍異貨。

武林舊事卷三說得更詳盡：

……而七寶，羅馬二社為最：玉山寶帶，尺量寸珠，瓊瑤奪目；而天驕龍旗，絨懸寶書，競賞神駿。好奇者至剪毛為花草人物。……這實和展覽會差不多了，其中大部份是為的生意經，但也有只是業餘的消遣，夢華錄卷十九說：

……武士有射弓踏弩社，皆能擊弓射弩，武士

……武士有射弓踏弩社，皆能擊弓射弩，武士

……武士有射弓踏弩社，皆能擊弓射弩，武士

……武士有射弓踏弩社，皆能擊弓射弩，武士

……武士有射弓踏弩社，皆能擊弓射弩，武士

……武士有射弓踏弩社，皆能擊弓射弩，武士

……武士有射弓踏弩社，皆能擊弓射弩，武士

……武士有射弓踏弩社，皆能擊弓射弩，武士

……武士有射弓踏弩社，皆能擊弓射弩，武士

……武士有射弓踏弩社，皆能擊弓射弩，武士

……武士有射弓踏弩社，皆能擊弓射弩，武士

……武士有射弓踏弩社，皆能擊弓射弩，武士

則主張抑退迷信，掃除迷信，打破神祕的傳說，可謂對宗教是相當的一攻擊。孔特的學說結果為極小數的份子所欣賞，與大眾無關，這在哲學固然無妨。但 Samuel 特「迷信」與神祕主義，從宗教中排除，結果宗教是否還成爲宗教，大成問題。至少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其不足以動衆，但可備見。

筆者願在此指出，宗教問題在中國頗能得自然發展之勢。比較來說，信仰自由在中國成了一種傳統的美德，譬如佛敎與他派間過去雖然不是沒有發生若干鬥爭，甚至有時也牽及政治，但爲時甚短，而且只成爲零星而無系統的糾紛，從來未曾像歐洲那樣在政治及社會上演爲巨大的長期的流血慘劇。基督教流入中國的初期，在宗教本身並未引起殘酷的鬥爭；其後的重大糾紛，與其說是中國人反對外教，不如說是中國人反對外教之變爲侵略工具。現在則此種現象早已成陳跡了。西方人士往往說孔子敎是爲一宗教，本書作者對此點似亦無明確的認識，甚至將孔子學說列入「古宗教」之列（見原書三十二頁），但亦認其爲一種體系而非神學（見原書三十三頁）。以科學的標準來說，並未將佛學當作宗教而加以排斥。在陸象山王陽明諸人手中，佛敎的哲學觀點雖已大大走私，混入「理學」而引起抨擊，但正統儒家所排斥的祇是其哲學的滲入，而對佛敎之爲宗教，並不加以重視。

的確，在宗教方面，各派並行不悖，在中國由來已久，於今尤甚。不待法律的保障，信仰自由早已蔚然成爲風氣，西方人士常常笑中國人無固定一信仰，以致道士與和尚可以同時在一個殿堂舉行典禮，但這似乎不失爲泱泱大國之風，這種泱泱大國之風在於尊重各教，並且尊重（容忍）不信教的人。無神論在中國從未受到像西方那樣口誅筆伐甚至於迫害。如果這種容忍是一種國粹，顯然這值得發揚光大的。在一百餘年前（一八一二年）詩人雪萊（Shelley）只因作了一篇無神論（The necessity of Atheism）而被牛津開除學籍。當代英美哲人羅素，大半因爲他反對宗教而被上述社會觀作叛徒加以打擊。法國第三共和國，因爲大革命後的遺風猶在，政教分離載在憲法，對於宗教自由，比較徹底。有的民主國其政治元首之頭銜包括「信仰的保護者」一項在內，這不能不認爲自由與平等之精神。似此看來，對於宗教有兩種極端態度。一種是宗教至上主義，這派的特色不在其對

科學的敬視而在其內部各教各派間鬥爭之爭。因爲這些鬥爭，其根本目的。另一極端是宗教排斥論者，但此說並非現代的禁前之說，此派的源起至少可以追溯到法國革命時代，一七九二至一七九四年愛特（Hébert）等人曾創「理知節」（Fête of Reason）以反對宗教，因而促起高爾士西（Robespierre）提倡「至尊節」（Fête of Supreme Being），洛氏以隨頭台解決這派無神論者的政治勢力，但不旋踵他亦被別人依樣解決了（註）。這亦是爲抹殺信仰自由而大戒。其後他哈爾薩的拿破崙發揮過一種見解，以爲宗教不過當者防止貧者反抗的必要武器，Gibbon 革新宗教的一個重大目的即在希望宗教「再不爲人民之鴉片」（原書第七十九頁）。

（註）愛特所領導者爲巴黎工人與貧民，以巴黎各區（Commune）爲根據，洛氏既被愛特，大眾甚失望，故洛氏被捕後，其黨曾向工人求救，無應者，乃失敗。這當然是一種政治鬥爭，但信仰問題亦被用作鬥爭工具。他這本書有一點似乎是一個缺點。他嘆息各教不能團結，而未指出：各大宗教，例如耶穌回各教的創始者無一不是偉大的領導人物，無一不是以悲天憫人的心腸，設教以期救人救世。尤是注意者，他們都是對當時各自所處的社會不平等與腐敗之反抗者，他們最基本的共同點在於以仁愛爲懷，求打破不平等與腐敗。後來的信徒虔守此義的固然甚多，然而將創教者尊爲神聖之後，卻遺其精華於腦後，而與世浮沈，甚至以宗教爲種種護符，亦不乏其人。這班人所爭執者只是一些武斷見解，甚至唯利是圖，這迫使他教爲「邪道」的手段，其背離創教者的精神是不待言的。如果要重建宗教的威信，此一點似亦值得注意。

比較來說，孔子對宗教的態度最爲正確公允。一不語怪力亂神一亦是孔子精神所在。他雖然也主張「祭神如神在」，卻誠人以「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對宗教的立場可以說是根據他那「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的科學精神，似不可因其帶了實驗主義（Pragmatism）的不徹底色彩而忽視之。把握這種精神，應該可以屏除 Samuel 所認爲的武斷教條了。文學是各種宗教的後門，正如科學是現代哲學的基礎。對於科學或宗教的選擇，吾從孔子。然而本書對宗教問題有一大貢獻。這貢獻不在其所希望宗教神聖化，而在其對當代的，尤其西方的宗教作了一個扼要而客觀的真實描述。從這

小傳

田園科學家丁穎

張作人

你愛聽田野秋收的打禾聲嗎？

不知是否厭倦都市的風塵與喧鬧，對於綠色的田野，薄暮的仙聲……牧童，尤其是田園老人，我更悠然神往了。

是的，誰曾細想過那些生活在都市中的飽經的貧寒者底悲憤的遭遇，他一定首肯我神往的所以，而覺得那受着鄉村漁樵的溫情的，被譽稱為「人瑞」的田園老人，真是幸福的。莊稼人眼裏閃閃的白點子，實在比那高過雲霄的王冠呵！

現在，在深山環抱的農場上，我發現了一位更該被尊為「人瑞」的田園科學家丁穎先生。

如同一般田園老人一樣，他有一個並不高大，而帶點羸弱的身軀，背子微彎，走起路來，如果忘記帶手杖（他不一定帶手杖），他的兩手是垂直的，上身向前傾，從一後看來，樣子也怪好聽。他慣穿灰布衣衫，或者黑棉襖。舉步有些浮腫，但尚未盡失他的青年時代的矯健的足音。

假如有一天，你碰見這位笑臉面的老人，當他揚帽向熟識的人打招呼時，你可以趁勢聽聽他，現狀的頭髮是中分的，面部雖然瘦削，但很有莊稼老人的康健光彩，唇上一抹灰白的鬍子。嵌在高大而鼻骨高挺的，是一對不太不小，單薄的，充滿柔和的眼睛。他容貌不見得十分特別，只是從較常人的格外廣闊的額看起來，好像照耀着智慧的光輝，這也許是科學家之所以為科學家的地方。

這位田園科學家今年已經五、六十歲了。他是廣東茂名人，早年留學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習作物栽培。回國以後，即在農學院前身——廣東大學農科任教，一直到現在從沒有離開過教學與研究的崗位。他是本校老教授之一，而長期特聘的教授，廿九年更獲主校專家鄧植儀先生任農學院院長。

通常談起農業問題，誰都知道增加糧食生產的方法很多，如解決農田水利，改良品種等等。但拿其中一點認真幹起來，便是夠消磨一個科學家的一生丁。這位田園科學家廿幾年來苦心研究的就是稻作育種這一方面。

全國許多省份的米糧常不足，尤其是廣東方面，問題更顯得嚴重，從廣東統計彙刊上知道，本省十幾年來洋米入口最高額的年份，在民十二為366,083担，在民二十是1,266,055担。而這位田園科學家已有成的新稻種有「東莞白」，「中山一號」，「白亮糯」等，牠們的風土適應性都很強，產量能增加百分之十以上。廣東八十縣的水稻田面積1,089,692畝，產米83,384,027担。假如這二千餘萬畝的水稻田，盡種「東莞白」等新稻種，全省產米可增加八百三十餘萬担。這樣，再努力推行冬耕，多種二三百萬石雜糧，洋米入口的漏卮問題，不是可以解決了嗎？

事實上，「東莞白」等新稻種，其中許多已推廣到本省各鄉村及鄰近各省了。

張國奎中，我們可以看出見宗教至少在西方是達到了什麼地位，達到了甚麼危機，這危機的嚴重正因其為難性的，因其為宗教本身覺得無法解決。這危機在第一次大戰前後已展開了。筆者記得當一九二七年遊Oxford時，在這個宗教的重鎮，親自發見青年們對於宗教的失望與非難是何等深切。世界經濟恐慌給予宗教的打擊是如何嚴重且不待言，現在侵略者掀起這次大戰，宗教所給予人們的安慰未免太可憐了。……

我們記得當教會權威的中世時代，歐洲正喘息於一有組織的無政府狀態——奧廣沙的愚昧之中，將歐洲從這種厄運救出的是科學而不是宗教。如果宗教的努力可以解決和平問題，則神聖同盟是應使歐洲進入幸福之域了。其實和平的保證有待於人類的理智的共同行動，倘若不建設合理的經濟制度，不實現民族的真正平等，不在新的基礎上重建民主主義，恐怕世界和平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即。此次大戰之後，宗教本身地位如何，尚有待於宗教本身之發憤的努力。就此而言 Samuel 之論，亦應請諸心長，足資參考。

Samuel 氏這張圖畫所呈現的中心問題便是：宗教似乎反對科學而走到不得不求助於科學，要宗教理智化，要宗教與科學知識調和以謀自存，這種呼籲實足以反映宗教有服從科學的必要，更足以證實科學之優越性。有極少數的科學家極端希望宗教與科學結婚，然大與迄今尚未舉行，是不是恐怕離婚後的棄婦其前途更漸淡呢？

現代有以美學代替宗教之說，蔡子民先生會力主之，這倒不失為一種有價值的建設性的見解。從美學中去求一溫情的，人性的與詩意的一信仰，似乎不惟更可貴，而且也可以為一些科學家解除在實驗室和教堂之間徘徊的內心矛盾吧？

最近，本省當局對於糧食問題日趨嚴重，特地請這位田園科學家選了許多計劃，如「改良廣東糧食生產計劃」、「改良廣東耕作生產實施方案」等。農林局稻改所，就是省府通過他的計劃實施後才設立的。他是支持稻改所的研究工作最力的一個人。

廣州陷落，丁先生的研究工作受到很大的阻害。他主持的「中大稻作試驗場」的「惠陽分場」和「東莞沙田分場」都失落了，現僅剩有一「龍路分場」，「珠江分場」及新開的「北江試驗場」，他本來工作目標着重於珠江三角洲區域的，現在却移轉到山地縣份了。他現率領一批農藝門畢業的弟子。孜孜不倦地幹着一件很艱巨的工作。他們企望在曲江縣縣信宜等二十縣中，以五年改進生產的結果，每畝收食五百萬担，內有白米一百六十萬担。這對於廣東真是一筆難得的財富。不，國庫的一筆難得的財富呀！

大概是民二十三四年間吧，丁先生會種得一種新種人的「千粒種」。一種禾百粒數已算上乘了，一種禾一千粒，那真是科學界奇聞。據他的一位高足楊宗錫醫師告訴我，那是用印度野生禾和廣東某黏雜交而得。前一種粒數多而「殼實」空虛，後一種粒數少而「殼實」品質良好，於是混而合之，兩取其長云。

民廿五，這位田園科學家，由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的補助，出版其名著「Wild Rice of Kwangung Ann New Variety: How From The Hybrid of Wild Rice With Cultivate Rice」。做國學術界也有日文翻譯，並舉「千粒種」為「不可思議的種」。當秋區撫摸著碩碩滿田金黃的果粒，我愈明白

這位田園老人的深沉愛好了。他原來是因爲如是真悅穗上的穀子，所以才名自己叫做「穎」(「穎」就是殼亮的意思)。正如一般景慕自然的寫作朋友，歡喜以自己愛好的野果或香蕈來做筆名一樣。

他這田園的人，他的性格也是田園化的。在這位老人身上，你總可以看出「熱情」、「穩健」、「樸實」等等中國農民的素質。他對於太太莫君願女士，也正如一般農家夫婦，相敬相愛，始終如一。聽說太太生前因爲子嗣問題，曾苦勸他納妾，而他却無論如何都不答應。可憐的老人，現在已經歸居了，賢慧慈祥的太太，是本年五月間在樂昌死的，只留下三年位幼的女公子。但，田園科學家並不因此灰心而停止工作。爲了熱愛祖國，熱愛人類，尤其是那些饑餓人羣，他仍然日日孜孜不倦地研究着，他希望開拓更多的土地財富！

然而，以我委測，這位田園科學家底靈魂深處也有悲哀的。在苗圃，在陌上，他總見到他垂頭沉思，似乎很憂傷的樣子。我又很驚心地想愛因斯坦被放逐時，斥責那班濫佔科學家所給予全人類幸福悲劇的悲劇了。愛因斯坦說，這世紀科學家所努力的，所發明的，已足超過幾世紀人類的享受了，而人類的生活仍然如是顛沛，流離，叫苦，就因爲那班憑藉自私的人們，連不上科學家的智慧與愛人類的博大襟懷……

世事是很難說的，讓我帶着藍色的憂鬱嘆息一下吧，但我並不絕望，我永久相信自行其志，自行其善，爲人類創造幸福的人是幸福的。他始終是一位應該被尊崇，被祝頌的田園科學家，應該被尊崇，更該被祝頌的田園老人。

文化記事

國立中央大學外國語文系主任許在志氏，近年來爲國內各雜誌撰述論文甚多，去歲應廣東印發館學生雜誌編者之約，特爲撰述英語學習講座，陸續在該誌發表，惜全文(共十二講)未曾刊畢，太平津戰事即突然爆發，最後五講原稿遂燬於香港。近聞有人與范氏接洽，將其補寫，並即擬速同已發表之各講集印爲單行本以饋國內讀者。又范氏於本年暑假內又着手撰作「語言哲學」一書，現已脫稿，聞即將交由陪都新成立之某出版社承印云。

國民外交協會駐印理事金克木，周達夫二氏，均旅居印度甚久，近感於印度問題之緊迫以及國人對印度之認識猶有特增進，特編印「當代印度叢刊」，由二氏負責(或特約專家)編譯各項稿件，經安寄國內刊布。聞已有成稿者爲「甘地論」(金克木譯)，「印度之學術界」(周達夫撰)，「印度革命領袖小傳」(金)，「英印回三角關係」(周)，「印度之政黨」，「印度之婦女」，「印度之對外貿易」，「印度之經濟狀況」，「印度之政治機構」，以及「印度之國語問題」等共十數種云。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抗戰之前，按期印發集刊專刊及田野工作報告等，均交由商務印書館印行，抗戰後該所遷至昆明，其各項集刊之編印並未停止，唯以仍由港滬兩地商務印書館發行，內地每不見到，現該所又將集刊第十本及第十

